

·文献学苑·

# 关于《韩非子》篇目真伪考辨的几点思考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韩非子》篇目真伪的考辨,历来是其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反观前人考辨的方法,有几个问题是今后考辨工作中所应关注并遵循的:一、《本传》关于韩非著作的著录基本是可信的;二、没有直接的证据《韩非子》中的篇目不应被轻易否定掉;三、对于已经被证实的伪作,在没有充分的反证之前,不可轻易推翻已有的结论;四、辨伪应综合多方面的材料,尽量避免以单一证据立论。

关键词:《韩非子》 真伪考辨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7)06-0121-04

##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an Feizi 's Content Titles

Ma Shin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an Feizi 's content title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oint in the research fields. Contrasting in the way of the former scholar '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re are som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en pay a close attention and abide by. Firstly, Ben zhuan about the recording of Han Feizi 's works is basically true. Secondly, the content titles of Han Feizi should not been easily denied if couldn 't offer a direct testimony. Thirdly, concerning with the false works which have been confirmed, we should not repudiate the former conclusion rashly if we can 't offer ample evidences. Finally, we should synthesize the materials of many aspects, and avoid to present our arguments depend on a single testimony.

Key words: Han Feizi;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enticity; methodology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6-0121-04

### 一 古书体例与先秦子书的真伪问题

先秦古籍的真伪是一个很重要、同时也很复杂的问题。它固然与古籍本身的真伪有关,与后人有意无意的作伪有关;也与古籍流传过程中的增补、散佚以及整理过程有关,与先秦古籍的成书体例有关;更与我们对先秦古籍真伪的认识、判定的标准和基本思想有关。张心澂先生《伪书通考》以及郑良树先生《续伪书通考》对此都有所论述。先秦子书的情况就更为特别。从其成书体例看,“诸子称子”,自为一家之学,题为某子,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而言之,“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sup>[1]</sup>另一方面,即使是后学之所附入,也有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如郑良树先生谈到《商君书》的真伪时说:“《商君书》当然不尽

是商鞅的真著;但是,也不必是他人的伪作”。根据个人的浅见,应该是商鞅及其学派的集体著作,小部分是商鞅的真著,大部分是学派里的学生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商鞅而言,固然是伪作;对商学派而言,无疑的却是真著了。”<sup>[2]</sup>因此,怎样认识先秦古籍的真伪问题、怎样对待传统辨伪工作的结果,进而反思其真伪考辨工作中的方法论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韩非子》篇目的真伪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除非我们不知道《韩非子》书中的篇章含有真伪的问题,否则研究或探讨韩非的思想之前,势必对这些篇章有所鉴定;情形就如研究历史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考察古代社会必须研究出土文物的年代一样,才能得出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sup>[3]</sup>其真伪考辨的必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 二 《韩非子》辨伪史的启示

《韩非子》一书在汉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间基本编成，其面目已与今本非常接近。<sup>[4]</sup>自汉至宋，其篇目真伪鲜有人怀疑。一直到南宋才有了不同的意见。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也。后人误以范雎书厕于其书之间，乃有举韩之论。”《通鉴》谓非欲覆宗国，则非也。“开始怀疑《初见秦》的作者是范雎，这就提出了《韩非子》的真伪问题，但并没有多大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关于此书真伪的讨论越来越热烈。翻检此时期以及稍后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到，除了《五蠹》《显学》等为数不多的文章，此书中其它篇目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似乎真如胡适先生所说：“依我看来，《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sup>[5]</sup>且不说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否准确，单就其学术史意义而言，它所给予学术界的启迪是极为深刻的。正如对疑古思潮科学的评价一样，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怀疑给《韩非子》一书的研究所带来的本质的改变，以及在此怀疑之下本课题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它彻底改变了盲目信古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对古籍文本的重新审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疑古思潮下的此项研究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有着诸多的问题。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一些研究者对于此书近乎全部否定的怀疑。这固然是其研究趋于全面与细致的体现，固然与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例如因为某一个后起字词的使用而否定一篇文章、甚至否定一部书，而不考虑古籍传抄过程中文字的被改动），更为主要的是疑古思潮的根本局限。因为它首先假定一部古书是不可靠的，进而，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真实”，或者其中存在着值得怀疑的因素，则断定它是“伪书”。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力图去纠正这种偏失，重新考察疑古学者们前面的考证，反思其方法，检讨其结论，以期取得更为科学的成绩。

综观20世纪以来的考辨工作，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容肇祖《韩非子考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蒋伯斧《诸子通考》、陈千钊《韩非子书考》、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张心澂《伪书通考》、高亨《诸子新笺》、陈启天《韩非子校释》、郭沫若《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陈奇猷《韩非子集释》（2000年增订为《韩非子新校注》）、梁启雄《韩子浅解》、赵海鑫《韩非子研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著述，如周勋初《韩非子札记》、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陈奇猷、张觉《韩非子导读》、张觉《韩非子全译·前言》、潘重规《韩非著述考》、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

想》，以及大量的专题论文，都从各个方面对《韩非子》的真伪问题作了探索，其考辨的结论更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全部集中在具体的结论中，而是更进一步去关注考辨本身，则《韩非子》篇目真伪考辨之中的方法论问题尤其值得思考。就目前来看，已有一些学者的论著或其考辨本身涉及到此问题，其中最为系统与全面的当是陈奇猷与张觉二先生在《韩非子导读》中的专门讨论。他们在《韩非子各篇的真伪》一节中，将前人辨伪的标准归为7种：1. 看是否符合韩非的思想体系；2. 看是否符合历史事实；3. 看文体；4. 看风格；5. 看用词造句；6. 看是否与其它典籍相重；7. 看是否与本书的其它篇章相重。并逐条进行阐释，揭示出其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sup>[6]</sup>后来，张觉先生在其《韩非子全译·前言》中又予以重申。<sup>[7]</sup>这既是对此前辨伪工作的理论总结与回顾，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启发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本问题。实际上，如果对前人关于《韩非子》篇目真伪考辨的方法作进一步的概括，则包括上引7条在内的各种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第一，从文章的内部要素去考察，包括思想的同异、史实的甄别、与其它典籍的关系等；第二，从文章的外部形式去考察，包括文章风格、文体特征、语言特点等。当然，文章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形式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在具体的实践中，各要素之间也常相互关联、互为表里。

反观这两个方面的辨伪方法，无论是以思想、学说、史实的差异去证伪，还是从风格、文体等视角去辨析，其结果都因为辨伪者在研究方法、角度以及目的上的不同而有着较大的分歧。有关各考辨方法利弊得失的学理分析，《韩非子导读》与《韩非子全译·前言》已有很深入的论述，此不再一一引述。这里我们也无意于对以往各种结论的具体评价，而是对今后《韩非子》真伪考辨中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更感兴趣。广而言之，这些问题对于先秦其他子书的辨伪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 三 真伪考辨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以下一些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其中的一些原则也是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坚持的。

第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下简称《本传》）中关于韩非著作的著录基本是可信的。《本传》云：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数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年按：《本传》此处所举《说难》一文，据我的考证，应当是《韩非子》中的《难》篇；而其后的文所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说难》，才是《韩非子》中的《说难》篇<sup>[8]</sup>。……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

《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之游,死不恨矣。”

《本传》并过录《说难》全文。司马迁是对韩非的生平与著述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的人《本传》就是他在全面考察韩非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学说、研读韩非著述的基础之上撰写成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时间上看,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当中最早的详尽记载。司马迁距离韩非的时代不是很远,正所谓“去古未远”,他的看法无疑要更为可信。如果连司马迁的所见、所说也不可信,那么他之后的记载就更值得怀疑了。这样,不仅是《韩非子》的真伪将无法理清,整个有关先秦古籍真实性的考察都将成为一笔糊涂账而无法清算。可是彻底的否定者恰恰认为《本传》的记载也不可靠,《韩非子》中《孤愤》、《五蠹》等文章是有问题的。而他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今本《韩非子》的55篇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来,就既否定了《韩非子》,又否定了《本传》,那么,到底凭什么去判定真假呢?这个问题正是他们所无法解决的。鉴于此,一种修正的意见认为,虽然《本传》不可信,然而据《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李斯与二世胡亥都引述过《五蠹》、《显学》的内容,因此这两篇是没有问题的。此种论述也不可信,诚如陈奇猷、张觉二先生所说:“李斯与二世引述《韩子》的话,也出于司马迁的手,同是司马迁的文章,为什么《李斯列传》靠得住,《老庄申韩列传》就靠不住了呢?”<sup>[9]</sup>

不仅如此,司马迁所见到的《韩非子》,其面目已与今本很接近,他列举韩非的著述,也并不是“只随举数篇,以见其大凡”,<sup>[10]</sup>而是有着特别的原因。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这些篇目或者是《韩非子》中某一体裁文章的代表,或者自成一体,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如果结合《本传》所说韩非“数以书谏韩王”以及“其归本于黄老”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所见到的本子当中还有《难言》、《爱臣》等上帝王书与《解老》、《喻老》等篇章。也就是说《本传》中已涵盖了今所存《韩非子》的各类篇章。<sup>[11]</sup>因此,即使不能绝对地说《本传》的著录完全可信,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它是基本可信的。

第二,在没有可靠的证据之前《韩非子》中的篇目不应被轻易否定掉。正如前文所说,司马迁所见《韩非子》已与今本很接近,可以肯定,西汉早期人已将这些篇目都归为韩非之作。退一步说,即使将《韩非子》的编者确定为刘向,他将这55篇汇集在一起,也足以表明当时人对《韩非子》真伪的看法。即使其中附有后学的作品,也是当作韩非的学说来看待的,此即余嘉锡先生所说“古书不皆手著”的道理。他在《古书通例》中说:“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所说虽为传注,亦可以用来说明诸子之书,即“传注称氏,诸子称子,

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他又说:“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而言之。《汉志》本之《七略》,上书某子,下注明某者,以其书有姓无名,明此所谓某氏某子者,即某人耳,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也。出于门弟子所编,其中不皆手著,则题为某子。”<sup>[12]</sup>虽是概括而言,亦可以用来说明《韩非子》。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对于古书作者的理解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伪作”,前人或许并不是看成伪作的。西汉人所持有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有充足的理由反驳,则还须谨慎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章在《韩非子》中存留下来一直保存到现代,本身就是有力的正面证据之一。当然,像《初见秦》这样的文章被误收在《韩非子》中,既是一个例外,也说明了古籍成书过程的复杂。

这里也需要辨明一种观点。一些否定者对《韩非子》一书的怀疑,是从学派上分析的,以篇中所反映出的道家、儒家、阴阳家等思想不合于韩非的法家思想而怀疑其作者。其实,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先秦诸子最初是分人而不分家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均是如此。至少,在《韩非子·显学》中也只是说“天下之显学,儒、墨也”,仅仅谈到了儒、墨两家,不足以看成是系统的学术派别。将先秦诸子系统地分家别派,以某家称某子已是西汉人的看法,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论六家要旨”。其后,刘歆的《七略》将诸子分为十家,这种观点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继承与推重而彻底确立了其权威地位。“九流十家”之说对于认识诸子学说的源流归属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倘若一味以“家”、“流”、“派”来区分诸子,则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了,容易掩盖诸子思想当中的具体内容与特征。而且,这种学术派别的区分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比较《汉书·艺文志》与《别录》、《七略》在学派归属上的“出”与“入”,看看宋钘、尹文等人在名家、道家等派别之中的游离,就可以明白汉人所持标准的模糊、各学派之间是怎样的相互包容了。另一方面,汉人所区分的“九流十家”,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截然对立。就韩非而言,他与道家、儒家的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渊源,司马迁所说其学“归本于黄老”,当是其来有自,并非向壁之说。《史记》中老、庄、申、韩合传,本身就昭示了一种学术的传承;而且,韩非又曾求学于荀卿,则与儒家的关系也非同寻常。<sup>[13]</sup>因此,如果将思想的差异作为真伪考辨的证据之一,其方法是可行的;而如果将其作为全部的证据,单是从思想上类似于道家、儒家来否认韩非的著作权,则证伪的理由并不够充分。

第三,对于已经被证实的伪作,无论是他人著作的属入,还是后学的附录,在没有相当充分的反证之前,也不应轻易推翻已有的结论。有些学者因为反对疑古思潮而矫枉过正,或者



主观认识的因素,将一些已很有可信度的结论重新推翻,认为《韩非子》一书都是韩非自己的著述,并没有真伪的问题。这种彻底否定“疑古”的态度也是值得反思的。

回顾20世纪学术史,疑古思潮是不能忽视的。以顾颉刚等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其探索是艰辛的,其成就也是巨大的,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为学界所共仰。然而,当重新审视这段学术史,科学、客观地评价疑古思潮的学术意义时,不难看出,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广泛的。由“怀疑一切”到“否定一切”显然值得再思考。正是在此意义上,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进而提出“走进考古”。<sup>[14][15]</sup>显然,这是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为《古史辨》所作《序》时所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深化。需要指出的是,“走出疑古”并不是“否定疑古”,疑古思潮对于学术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容忽略,所取得的成绩也决不可小视,其科学的结论更需继承。“走出疑古”只能是在全面研究疑古思潮的基础上进行。就先秦子书的研究而言,只能是批判地认识、继承疑古派所取得的成就,结合先秦古书的体例来认识其真伪问题。因此《韩非子》中可以确证为他人之作的,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去认定它,而不能因为个人的主观因素曲为之说。全面的否定是不科学的,同样,全面的肯定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对“疑古”的反思不是再回到信古中去,而是要客观地“证古”或者“考古”,尤其要正确认识疑古思潮下的研究成果,科学对待已经取得的结论。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目前的研究当中也有一种“全面肯定”的倾向,这是今后的研究所应注意的。《初见秦》《有度》《问田》《制分》等文的真伪均需作如此的看待。而且,前面也提到,证明非韩非所作并不是全部否定其价值。无论是后学之作,还是他人作品的属入,至少可以将其作为西汉前期已编入《韩非子》的材料来看待,这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第四,辨伪应综合多方面的材料,尽量避免以单一的证据来立论。前人在考辨当中,常因某一点的怀疑而否定全篇。前面所说以思想学说的差异来判断即是表现之一。甚至有学者以文体特征、文章风格等“不类韩子”而作唯一的论据,自有些过于草率了。且不说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单就文体特征与文章风格而言,它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存在,并没有单一的标准。而且,先秦时期,一个人用怎样的文体写作,固然与其习惯及个人擅长有关,更多与文体本身的选择也密切相关。先秦时文体的选择更多侧重于运用,与其实用性紧密联系。就文体本身而言,战国晚期,文体已经处于自觉的阶段,作家在选用某种文体写作时,更多要考虑到该文体的自身特点,因此,不同文体

类别的文章汇集在《韩非子》中,只能表明其多样性,如书表体、政论体、对问体、“难”体、“说”体、解释体等,而不能因此否定其著作权。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的文章可能有一个整体的风格,但是,它只能说明大致的情况,就具体的文章而言,其风格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韩非子》的文章风格,研究者在评价时往往有“犀利峭拔”或者类似的意见。其实,这个概括不仅很模糊,而且也很不全面,不足以涵盖每一篇作品。以之来评论《孤愤》《说难》《亡征》《五蠹》等自然无不妥,但如果以之来评论《说林》2篇《储说》6篇《难》4篇,以及《主道》《扬权》、《解老》《喻老》等文章,则非但不恰当,而且还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在政论体的“犀利峭拔”之外,还要看到书表体的严肃诚恳,“难”体的严谨细致,“说”体的生动诙谐,解释体的深奥古朴等不同的风格。况且对于文章风格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很难有客观的标准。

因此,要确定一篇文章的真伪,必须要综合多方面的材料来整体考察,从文章所反映的史实、思想、风格、语言等各方面作立体的分析。而且,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化,地下出土材料大量涌现,我们可以很好地结合这些新材料做实证研究,不可仅仅因为某一点的怀疑而遽下断语。不独《韩非子》如此,对于整个先秦子书的考察而言,均应有这样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10][12]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82,184,190,192.
- [2] 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自序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3] 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7.
- [4][8][11][13] 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
- [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A].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6][9] 陈奇猷,张觉.韩非子导读[M].巴蜀书社,1990:51-79.
- [7] 张觉.韩非子全译前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14]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15] 吴少琨,赵金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马世年(1975-),男,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